

《管子》文献学研究

Guanzi Wenxianxue Yanjiu

郭 丽 著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GuanZi WenXianXue YanJiu

《管子》文献学研究

郭 丽 著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 青 岛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管子》文献学研究/郭丽著.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7.3
ISBN 978-7-81067-979-4

I. 管… II. 郭… III. ①法家②管子—研究 IV. B22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1168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香港东路 23 号

邮政编码 266071

网 址 <http://www2.ouc.edu.cn/cbs>

电子信箱 hdcbs@ouc.edu.cn

订购电话 0532-82032573(传真)

责任编辑 蔡 卫

电 话 0532-85902342

印 制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mm×960 mm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200 千字

定 价 20.00 元

丛书策划/纪丽真

责任编辑/蔡 卫

封面设计/光 禾

终 审/丽 真

面朝大海博士文库

《管子》文献学研究

大众文化的美学阐述

生态文化学与30年代小说主题研究

目次

绪论 《管子》研究综述·····	(1)
第一节 《管子》的产生和流传·····	(1)
第二节 历代的《管子》研究(上)·····	(4)
第三节 历代的《管子》研究(下)·····	(9)
第四节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管子》文献学热点研究 ·····	(15)
第一章 银雀山和敦煌史料与《管子》互证 ·····	(21)
第一节 银雀山《王兵》与《管子》的互证 ·····	(21)
第二节 敦煌抄本引《管子》考略 ·····	(39)
第二章 唐宋类书与《管子》研究 ·····	(44)
第一节 《北堂书钞》的研究 ·····	(44)
第二节 《艺文类聚》考略 ·····	(47)
第三节 《群书治要》引文考略 ·····	(53)
第四节 《初学记》引《管子》考略 ·····	(57)
第五节 杜佑研治《管子》考略 ·····	(60)
第六节 《管子》传本在宋初的形态推测 ·····	(68)
第七节 《太平御览》与《管子》比较研究 ·····	(75)
第三章 宋以来《管子》传本研究 ·····	(82)
第一节 宋本《管子》的保存和流传 ·····	(82)
第二节 杨忱和张嶠考略 ·····	(86)
第三节 房玄龄还是尹知章注释了《管子》 ·····	(89)
第四节 浙刻本版本考论 ·····	(94)

第四章 明刻《管子》考论	(97)
第一节 明刻刘绩《管子补注》考述	(97)
第二节 《中都四子》本《管子》考论	(110)
第三节 赵用贤本考论	(119)
第四节 《管子榘》考论	(136)
第五节 凌汝亨本《管子》考论	(139)
第五章 清代和民国间《管子》考论	(143)
第一节 《四库全书》中所收刘绩《管子补注》考论	(143)
第二节 《四库全书》中所收赵用贤本考论	(153)
第三节 清刻赵本和明刻赵本比较	(158)
第四节 《二十二子》本《管子》考论	(162)
第五节 《百子全书》本《管子》考论	(169)
第六章 《管子》善本平议	(176)
结 语	(190)
参考文献	(198)
后 记	(204)

绪论 《管子》研究综述

第一节 《管子》的产生和流传

一、《管子》书的产生

管仲协助齐桓公称霸诸侯，功业伟大。先秦史籍和子书多有记载，其中《春秋》、《左传》、《国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庄子》、《韩非子》、《墨子》、《荀子》、《文子》、《列子》、《鹖冠子》亦有相关内容。孔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云：“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①评价甚高。

《管子》书至晚在战国中期已经完成，韩非子曰：“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韩非子·五蠹》）可能在齐国稷下学宫结束之前，学者对此书有所补充和修订。汉代《管子》继续流传，《史记·管晏列传》提到《管子》的一些篇章，司马迁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②，亦言其书“世多有之”，可知在汉初《管子》流传甚广。到成帝时，刘向集中、外藏本而作整理，定为八十六篇，叙录曰：“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

① 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0年版，第982页，第989页。

②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36页。

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也。”^①

本论文考查的对象主要是刘向校订后的本子,至于刘向校订前的所谓古本,仅讨论银雀山汉简相关篇章。

二、《管子》书的流传

《管子》书最初是以篇的形式流传。《汉书·艺文志》著录:“《管子》八十六篇。名夷吾,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也,有《列传》。”颜师古注:“‘筦’读与‘管’同。”^②《隋书·经籍志》著录:“《管子》十九卷,齐相管夷吾撰。”^③唐代中期,尹知章为《管子》作注。根据《新唐书》和《旧唐书》,《管子》在唐代有无注本和有注本两种形式,从唐代类书引《管子》推断,其时《管子》的形式与今本相差不大,唐代《管子》应当是现今的形态。那么,《管子》书中失传的十篇主要是在汉代刘向校书之后到初唐之前佚失的。李善注陆机《猛虎行》引江邃《文释》曰:《管子》云“夫士怀耿介之心,不荫恶木之枝,恶木尚能耻之,况与恶人同处”。李善言:“今检《管子》近亡数篇,恐是亡篇之内,而遽见之。”^④可知唐初已非完本。严可均《铁桥漫稿》称,《管子》本八十六篇,至隋时亡《正言》、《封禅》、《言昭》、《修身》、《问霸》、《牧民解》、《问》、《乘马》、《轻重丙》、《轻重庚》十篇,宋时又亡《王言》一篇。则到宋时共亡十一篇,《封禅》是尹知章据《史记·封禅文》补入,现存《管子》共七十六篇。

《旧唐书·经籍志》著录“《管子》十八卷,管夷吾撰”。《崇文总目》著录“《管子》十八卷,管夷吾撰”,又著录“《管子》十九卷,唐国子博士尹知章注”^⑤。《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管子》十九卷,管仲著。杜佑

① 黎翔凤《管子校注》(全三册),北京: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2004年版,第3页。

② 《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29页,第1732页。

③ 《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03页。

④ 萧统《文选》,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94页。

⑤ 王尧臣《崇文总目》,《中国历代书目丛刊》据粤雅堂丛书本影印,北京:现代出版社,1987年版,第84页。

《管氏指略》二卷。尹知章注《管子》三十卷。”据吴兢《书目》可知，尹注《管子》凡三十卷，今存十九卷，自《形势解》篇而下十一卷亡，则《新唐书》著录的尹注《管子》为全本，《崇文总目》著录尹注《管子》十九卷，非全本。

《旧唐书》著录“《管子》十八卷”，《新唐书》则曰“《管子》十九卷”，两书著录《管子》相差一卷。根据章炳麟和后来学者如张固也诸人的考订，两书当是指同一个本子，可能是题为“十九卷”者将《管子》书的前言和目录都算作一卷，于是就有十八、十九卷之分。至于尹知章《管子注》，全本为三十卷，但是注本出现后不久就有亡佚，而成为十九卷。

唐时题管仲撰的《管子》和题尹知章注的《管子》同时并存，到北宋庆历年间，杨忱为尹知章《管子注》作《序》，此时，尹注《管子》已经析为二十四卷。据现有资料考订，《管子注》在绍兴年间，刊行了墨宝堂本和浙刻本两种；其中浙刻本是张嶷根据《管子注》重新校订的新版本，与北宋的杨忱《管子序》本有所不同。此后，尹知章作注的《管子》大行于世。

明代初年，刘绩《管子补注》问世，朱东光《中都四子》本系翻刻刘绩本，版刻特征与刘本比较接近，并改正了刘绩本的一些讹误，却出现新的讹误。万历十年赵用贤《管韩合刻》本《管子》，集南宋浙刻本和明代刘绩《管子补注》之长，形成新本《管子》。此本影响甚大，此后的《管子》刻本，多出自赵用贤本。赵用贤本在清代光绪年间又有翻刻本，订正了明刻赵本讹误，刻印精审，成为最通行的本子。相较之下，刘绩系统本的《管子》因为其自身脱漏语句较多，文字讹误较浙刻本和赵用贤本多，虽然版本保存了部分古字古义，仍然渐趋式微。至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管子》，采用南宋绍兴年间浙刻本（有杨忱旧序）《管子》为底本，兼用刘绩本作补订。

三、现存的《管子》文献资料

银雀山汉简《〈守法〉〈守令〉十三篇》中的《王兵》，全篇是由《管子》中《七法》、《地图》、《参患》等篇组成。根据笔者考证，当是汉简《王兵》抄撮《管子》相关篇章。据此可以推断《管子》成书年代早于多数研究者论证的年代，许多学者所谓汉代以后《管子》尚在编纂的论断当有误。

敦煌抄本中亦存有少量《管子》残片。据郭沫若《管子集校》，有三个片段。其后是南宋绍兴年间墨宝堂本和浙刻本《管子》，两本《管子》非为一个系统。墨宝堂本《管子》传至山东海源阁杨氏，后在民国年间亡佚，20世纪初，傅增湘氏曾在天津见过，不知飘落何所。南宋浙刻本《管子》是现存最早的全本《管子》，印刷精美，前有序，后有跋，中有阙页，黄丕烈据抄宋本补，成为完本。其后有明初刘绩《管子补注》本，藏于国家图书馆，以陆貽典校宋本最有价值。《中都四子》本《管子补注》因为《丛书集成续编》影印之故，较易见到。流传最广的善本是明万历十年刊行的赵用贤本《管子》，保存最多。浙江大学图书馆即有藏本。

第二节 历代的《管子》研究(上)

一、汉唐明清的《管子》研究

(一)《管子》的文献学研究

对《管子》作详细研究者首推唐人尹知章。尹知章的《管子注》是研究《管子》的开山之作，疏通《管子》文义，对解读《管子》提供巨大的帮助。尽管后来的学者对尹《注》批评有加，可是至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人的《管子注》能代替尹注《管子》，后来的研究者均在尹《注》的基础上作考证。之后杜佑作《管氏指略》二卷（据《新唐书·艺文志》），此书已亡佚，内容不可知晓。杜佑《通典》，摘录《管子》诸多内容，《轻重》部分占有主导地位，可以推测，杜氏的《管氏指略》当多与经济制度内容有关。

明代的《管子》研究，主要有刘绩《管子补注》二十四卷；朱长春《管子榷》二十四卷；梅士享《论叙管子成书》十五卷。

明初刘绩著述颇多，《管子补注》是在尹《注》基础上作的发挥和引申，《四库全书总目》称“故于旧解颇有匡正，皆附于原注之后，以绩按别之。虽其循文诠释，于训诂亦罕所考订，而推求意义，务求明惬，较原注

所得已多矣。”^①朱长春《管子榘》是在赵用贤本基础上作阐述，篇首曰评，篇中曰通，篇末曰演，统论篇章主旨。《四库总目》云“凡例文评，俱仍其旧，惟每篇各加叙释”，“创立异名，无所阐发”^②。《管子》传本多为二十四卷，梅士享合为十五卷，著者朱长春根据对《管子》的理解作论叙，在一篇中分上下二栏，认为是《管子》原本者，列作上栏，认为是后人掺杂或者语义有所不妥当者，列作下栏。作者对文义有所阐发者，以“梅生曰”作标识，《四库总目》批评云“读诸子书而必以经义绳之，何异阅晋唐行草之迹而纠以《说文》之偏旁耶？”^③

清代研究《管子》者较前朝为多。据《清史稿·艺文志》^④，主要的研究成果有：方苞《删定〈管子〉》一卷；戴望《管子校证》二十四卷；洪颐煊《管子义证》八卷；庄述祖《弟子职集解》一卷；洪亮吉《弟子职笺释》一卷；任文田《弟子职集注》一卷；王绍兰《管子地员篇注》四卷。又据《清史稿艺文志拾遗》^⑤，《管子》的研究论著还有：丁士涵《管子校本》二卷，稿本；《管子校议》不分卷，稿本；《管子按》不分卷，稿本；《管子案残稿》不分卷，稿本，共四种。张佩纶《管子识语》不分卷，稿本；《管子学》不分卷，稿本；《抄太平御览引〈管子〉》，不分卷，稿本；《白帖引〈管子〉》，不分卷，稿本，共四种。任兆麟《管子》一卷；何如璋《管子析疑》不分卷，稿本；周悦让《管子通》，一卷；许光清《管子校》一卷；许玉琢《读管子》一卷；杨深秀《管子校误》一卷。

除《清史稿·艺文志》和《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所著录者之外，还有清代学术大家对《管子》版本文字作考订。王念孙《读〈管子〉杂志》；俞樾《诸子平议》；张文虎《舒艺室随笔》；孙诒让《札迻》诸书，很有影响，郭沫若在《管子集校叙录》中说王念孙、俞樾、孙诒让对《管子》的研究成果非常有价值，可“鼎足而三”，王念孙考证功力甚深，他对《管子》的研究成果，部分已经为银雀山汉简所证实。又有俞正燮《癸巳类稿》作《管氏

① 《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47页。下引该书均为此版本。

② 《四库全书总目》，第849页。

③ 《四库全书总目》，第850页。

④ 《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334页。

⑤ 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93～1094页。

三归义》，作者在书中还有对《管子》文句的考订。

相当于清朝中后期，日本的《管子》研究成果主要有：猪饲彦博撰《管子补正》，日本宽政十年（即嘉庆三年）精刊；安井衡撰《管子纂诂》二十四卷，《附纂诂考伪》一卷，日本庆应间（即同治六年）精刊。

（二）《管子》作者和时代的论争

《管子》成书之后，比较多的争论是《管子》的著者问题。从《史记》文评看来，司马迁认为《管子》是管仲自著，故曰：“余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详哉其言之也。”此后，历代史书著录均题作“管仲撰”或“管夷吾撰”。至于《管子》一书是否是管仲所作，自晋朝开始，学者即有疑问。傅玄说“《管子》书过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轻重》篇尤鄙俗”，叶梦得也说“其间颇多与《鬼谷子》相乱，管子自序其事亦泛滥不切。疑皆战国策士相附益。”^①叶适《习学记言》曰：“《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莫知谁所为。以其言毛嫱、西施、吴王好剑推之，当是春秋末年。又持满定倾不为人客等亦种、蠡所遵用也。其时固有师传，而汉初学者讲习尤著。”^②朱熹曰：“《管子》之书杂。管子以功业著者，恐未必曾著书。如《弟子职》之为，全似《曲礼》。他篇有似《庄》、《老》。又有说得也卑，直是小心智处，不应管仲如此之陋。”又曰：“《管子》非仲所著。仲当时任齐国之政，事甚多。稍闲时，又有三归之溺，决不是闲功夫著书底人。著书者是不见用之人也。其书《老》、《庄》说话亦有之。想只是战国时人收拾仲当时行事言语之类著之，并附以它书。”^③宋濂《诸子辩》曰：“是书非管仲自著也。其中有绝似曲礼者，有近似老庄者，有论伯术而极精微者，或小智自私而其言至卑污者。疑战国时人，采掇仲之言行，附以他书成之。不然，毛嫱西施，吴王好剑，威公之死，五公子之乱，事皆出仲后，不应豫载之也。朱子谓仲任齐国

① 上引语并参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二十五史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卷二，第1412页。

② 叶适《习学记言》，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年版，子部155，第750页。

③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三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52页。

之政,又有三归之潮,奚暇著书,其说是矣。”^①明代朱长春《校管子旧序》曰:“故其书杂者,半为稷下大夫坐议浮谈,而半乃韩非、李斯法家辈袭商君以党管氏,遂以借名行者也。”^②又在《管子补注序》中略曰:“全书多杂,大率伪作……其书有春秋之文,有战国之文,有秦先周末之文。”^③

清人修正前人的观点,从门派来说明这个问题。因为在先秦早期题名为某子书者,非其人自著,可能是门弟子对先师言行的记录,亦有本学派观点的发展。章学诚曰:“春秋之时,管子尝有书矣。然载一时之典章政教,则犹周公之有《官礼》也。记管子之言行,则习管氏法者所缀辑,而非管仲所著述也。”^④严可均《铁桥漫稿》卷八《书管子后》认为先秦子书,不必手著,皆弟子或宾客或子孙撰定。

综上,《管子》一书的作者,正统史书均著录管仲撰,但是,对《管子》作者的论争从汉代即已经开始,多数学者认为《管子》书是在管仲去世之后逐渐完成的,至迟在秦朝统一之前即已经完成,后学者多是管仲的门客或弟子或后代子孙,他们承继管仲思想余绪,将《管子》一书编纂完成。

二、清末至建国之前《管子》研究

(一)侧重于篇章文字考订和断代研究

清朝覆亡前后至民国初年,多数研究者采用的方法与清代乾嘉学派的研究方法大略相同,多是对《管子》文本文字的考订,又有学者以周秦彝器考定《管子》的篇章,主要的研究成果有:章炳麟《管子余议》;刘师培《管子斟补》;于省吾《双剑謔诸子新证》;罗根泽《管子探源》;石一参《管子今诠》,作者将《管子》二十四卷重新分类编次,校正文字并衍

① 宋濂《〈诸子辩〉并序》,《文献学论著辑要》,张舜徽选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7页。

② 朱长春《管子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张维枢刻本,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版,子36,第10页。

③ 《续文献通考》,台北:新兴书局影印清高宗敕撰殿本,1956年版,第4218页上。

④ 《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2页。

释。此外还有：陶鸿庆《读管子札记》；尹桐阳《管子新释》；庞树典《管子补注疏义》；李哲明《管子校义》；黄巩《管子编注》。

上述民国年间研究成果，特别是于省吾《诸子新证》“本之于甲骨、彝器、陶石、铍化之文，以穷其原，通之于声韵、假借、校勘，异同之方，以穷其变”，“以古文字、古器物为左证者，约十之二三；依校勘异同，声韵通假为左证者，约十之七八，其发明新义，证成旧说，或为昔贤及并世作者所未道及”^①，标志着《管子》研究的新阶段。

罗根泽《管子探源》，将管子《经言》、《外言》、《内言》、《短语》、《区言》、《杂篇》、《管子解》、《轻重》八部分，根据篇章的用语特点和思想，逐篇断代，“都《管子》八十六篇，亡者十篇。著作年代，早者在战国，晚者在汉初文、景、武、昭之世；惟《幼官图》似在汉后，但止此一篇耳。著书托古，各附一人，除绝对妄诞者，率有依托之因。故列御寇，道家也，后人依为道家之书；孔藏，儒家也，后人托为儒家之言。《管子》书非管子作，毫无疑义。”^②又曰“《七法》，战国末为孙、吴、申、韩之学者所作”，“《地图》，最早作于战国中世”，“《参患》，汉文、景以后人作”。根据1972年银雀山汉简《王兵》篇，可以推断《七法》、《地图》、《参患》作于战国中期以前，罗氏对《七法》和《参患》的断代偏晚。罗根泽根据《管子》的八个部分考察篇章时间的思路，给后来的研究者以启发。

（二）侧重《管子》义理方面的探讨

20世纪初期，知识分子在寻求富国强民的道路过程中，将目光投向《管子》，他们从管仲的生平事迹和《管子》书中寻求可以使中国走向富强的方法。颜昌晓《管子之政治学说》、屈雄《管子的政治思想》、姜忠奎《管子村治考》、李皓《管子财富主义的分析》、姚步唐《管子的财政思想》、黄汉《管子经济思想》、郭垣《管子的财政政策》、陈天行《管子盐政政策》、刘培佳《管仲之土地政策》、邹珍璞《管子之财政与贸易政策》和《管子的经济思想及经济政策》等，至今影响甚大。梁启超《管子传》^③，

① 于省吾《双剑謄诸子新证》，上海：上海书店，1999年版，第202页，《序》。

② 罗根泽《管子探源》，自《诸子探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68页。

③ 梁启超《管子传》，上海：上海中华书局印行，1936年版。《饮冰室全集》中亦有收录。

考察管子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认为可以与世界有名思想家相抗衡。其后是戴潜《管子学案》^①。此书分为管子事业,《管子》篇目真伪考,管子之政治学、哲学、法理学、经济学、教育学、军事学,管子与诸家学术之渊源,历代管子平议等十章。书前有胡朴安、程善之《序》及作者《自序》;书末附录《管子书目考》。这部论著既有《管子》篇目和生平的考证,又有对《管子》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探讨,时至今日,仍然很有影响。

第三节 历代的《管子》研究(下)

一、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管子》研究

此期的主要研究成果是郭沫若《管子集校》^②。郭沫若以闻一多和许维遹的手稿为基础,搜罗宋明清十多种善本,进行校订,取得了巨大成就。著者在清代王念孙、俞樾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排比众家成果,作出判断,其成果之大,一时无人能及。《管子集校》出版之后,引起很大反响,争论的热点是杨忱的生平和刘绩为何时代人的问题,此外,还有刘绩本《管子》的避讳问题。郭沫若在《管子集校·叙录》认为杨忱是元代人,刘绩为辽代人,刘绩本《管子》避宋金元之讳。针对这一问题,最早提出疑问的是朱理惺、黄明^③,他们撰文《关于杨忱和杨刻“管子”的问题——读郭老“管子集校叙录”后记》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通过黄丕烈的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九和王安石写的墓志铭(见《临川文集》卷九十三),论证杨忱为北宋人。此后,郭沫若写了《一封信》(《关于杨刻〈管子〉的问题》)^④,作响应,对于朱、黄二人的结论颇不以为然。

① 戴潜《管子学案》,上海:上海正中书局,1949年版。1994年学林出版社再版。

② 郭沫若《管子集校》,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

③ 《光明日报》1957年4月25日。

④ 郭沫若《光明日报》,1957年5月9日。

王欣夫在《学术月刊》上发表《郭沫若先生〈管子集校叙录〉之商榷》^①，对“管子宋刻‘杨忱本’之版本问题”、“《管子补注》者刘绩之时代问题”作全面深刻的剖析，立论深刻，学术功力深厚，对《管子》文献学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1958年中华书局出版夏纬瑛《管子地员篇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再版。作者根据土地与植物的关系，论述各种土地对于农林生产是善还是恶的差别；认为此篇当作于周秦之际，是我国最古的有关生态地植物学论著。历来注释者大多是文字上的考证，作者从土地与植物的关系出发所作的探讨，与历来的校注不同。此前虽然有清代王绍兰作《管子地员篇注》，此后也有一些相关论著，如《〈管子·地员篇〉研究》，《〈管子·地员篇〉探微》^②；《〈管子·地员篇〉的区域性探讨》^③，《〈管子·地员〉篇中的植物生理学知识》^④等文，影响均不及《管子地员篇校释》为大。因为作者不仅文字功底深厚，而且又是科学工作者，一身二任，研究视角较新，对探讨先秦时期的农业发展水平，有很大帮助。

马非百1956年在《历史研究》发表《关于〈管子·轻重篇〉的著作年代问题》，倡言《轻重》诸篇作于王莽时期；容肇祖在1958年《历史研究》第1期撰文《驳马非百〈关于〈管子·轻重篇〉的著作年代问题〉》，认为《轻重》应属于战国时期的作品。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铨》^⑤于1979年由中华书局印行，到2004年已经印行到第三版。马非百认为《轻重》诸篇与《管子》的其他部分不是一个思想体系，是“西汉末年王莽时代的人所作”。针对《新铨》的，有胡家聪《〈管子·轻重篇〉作于战国考》^⑥。容肇祖、胡家聪都认为《轻重》应属于战国时期，胡文所论更为详密，推

① 王欣夫《郭沫若先生〈管子集校叙录〉之商榷》，上海：《学术月刊》，1957年第6期。

② 《农史研究集刊》（第一辑），中国农业研究院、南京农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③ 《农史研究集刊》（第二辑），中国农业研究院、南京农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

④ 李明启《〈管子·地员〉篇中的植物生理学知识》，上海：《植物生理学通讯》，1979年第1期；又载《农史研究》，1980年第1期。

⑤ 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铨》（全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⑥ 胡家聪《〈管子·轻重篇〉作于战国考》，北京：《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

进了这一问题的展开和研究。此后 1992 年李学勤《〈管子·轻重篇〉的年代与思想》综合诸说,依据近年山东出土的文献资料,考订《轻重》诸篇为战国末世《管子》一系学者的著作;认为《〈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和《乘马》一样,都是战国时期齐国的作品,把《管子》轻重部分“定为战国末世《管子》一系学者的著作最为切当”^①。

20 世纪 60 年代《管子》的研究也深受当时政治思潮的影响,一些著名的学者在比较权威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考察《管子》的阶级性问题。主要的论文有 1963 年叶世昌在《学术月刊》第 2 期发表《〈管子〉的经济思想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胡寄窗在此刊物第 4 期发表《〈管子〉代表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利益》;姚家华在《学术月刊》第 6 期发表《〈管子〉究竟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同年 7 月 9 日由文叔整理的《〈管子〉究竟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在《文汇报》上发表。可见,《管子》所代表的“阶级”是当时讨论的一个热点。

二、20 世纪 80 年代后至今的《管子》研究

(一)对《管子》作注解和生平诠释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赵守正《管子注译》(上、下)影响很大。其后,作者又有《管子通解》、《白话管子》等,成果颇丰。对《管子》作注释的还有钟肇鹏的《〈管子〉简释》;周瀚光等人的《管子直解》;孙波的《管子》全文注释本;陈庆照、李障天的《管子房注释解》;关立勋的《管子名言译评》;刘柯、李克和的《管子译注》。

对管仲生平作研究者,有高连欣的《管子传》,《神机相国:管子的故事》;刘兴富的《贤臣名相:管子》;朱少华的《匡世经纶——管子谋略纵横》;程国政的《管子:权霸人生》,《管子雅话》;王海峰、林勇斌的《〈管子〉一日一语》;战化军的《管仲评传》等。

(二)经济、思想、政治专论研究

80 年代之后,《管子》微言大义的研究是一个热点。管仲在经济政

^① 李学勤《〈管子·轻重篇〉的年代与思想》,《道家文化研究》第二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版,第 330~335 页。